

社会流动、地位市场与经济增长^{*}

唐世平

社会流动渠道，或说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因为它调控地位市场的激励结构。本文将“社会不流动”的概念扩展到包括从种族清洗到性别和年龄歧视在内的所有歧视现象，并且阐释了它是怎样阻碍经济增长的。文章还认为，理解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中两种激励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 社会流动 地位市场 经济增长 歧视 制度

作者唐世平，196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本文献给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王民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是本文最初的灵感源泉之一。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即个体或群体在分层（即等级和不平等的）社会中的运动，一直是当代社会学中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社会学家们所关心的要么是社会分层的演变，要么是社会流动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或者是经济发展对社会流动率的影响。除了社会分层中的“功能学派”之外，社会学家几乎没有讨论过社会流动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在贝克发表了其名作《歧视经济学》之后，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歧视及其相关问题变成了

* 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蕴岭教授对作者多年的理解、支持和宽容；感谢 Roland Benabou、Yukon Huang、Andrew Walder、Gungwu Wang（王赓武）、王好立、张建军、张宇燕、赵力涛和三位匿名审稿人的批评、讨论和建议；以及曹筱阳、蓝建学和王玉主在收集资料方面的支持。限于篇幅，作者对原文的实证部分、参考文献和注解都作了大量删节。文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是作者的责任。

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流动的纵向（垂直）维度。

社会分层中的功能学派并没有明确讨论社会分层或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分层具有“把个人安排在社会结构中并加以激励”的社会功能，因此暗示它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可见 Kingsley Davis and Wilbert E. Moore,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2, no. 2 (Apr. 1945), p. 242; John H. Goldthorp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6, no. 4 (Dec. 1985), pp. 550—51。

Gary S. Becker,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经济学中一个重要领域。但是，经济学家们的兴趣似乎主要是为歧视现象提供经济学的解释或是了解歧视所造成的微观经济后果（如在工资和寿命等方面），而很少注意歧视造成的宏观经济后果。同样，虽然社会流动显然至少部分地是由社会制度（即正式规则）所决定的，从而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流动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几乎没有讨论。

所以，尽管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者都研究过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却还没有将支持社会流动的制度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换言之，我们还从未严肃地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

本文提出两个主要论断，试图将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从而也将社会流动和现代化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

第一个论断是，社会流动渠道（channel of social mobility），即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和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因为社会流动的渠道调控着地位市场中的激励结构，类似于产权通过影响物质市场中的激励结构而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渠道通过影响个人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一重要动机而影响经济增长。

第二个论断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两个市场中的激励结构（即物质市场中的产权和地位市场中的社会流动渠道）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演变至关重要。实际上，就激励结构而言，现代工业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正是在于前者在两个市场中都为个人的努力提供了激励，而后者最多只在一个市场中提供了激励。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如何使个人在两个市场中的努力相互促进的过程。

定 义

和希尔斯主要从物质层面来界定地位经济（或市场）（positional economy or positional market）不同，本文把地位市场定义为一个社会中等级结构的总和，虽然地位市场中的地位通常和物质权利相联。在地位市场中，个人为社会地位而竞争，而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其在社会认可的等级中的级别或位次。和物质市场中的情况相比，地位市场中的竞争是纵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应是内在有限的。

社会流动渠道（the channel of social mobility）是指调控个人和群体在地位市场中升降的制度系统。直观地说，社会流动渠道将社会流动调控在两个极端中间：一端是完全缺乏社会流动，另一端是有“足够”的社会流动。

Kenneth J. Arrow, What Has Economics to Say about Racial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2, no. 2 (Spring 1998).

有几个例外是 Lykke E. Anderson, Social Mobility in Latin America, Institute for Socio-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dad Católica Boliviana, Bolivia (Nov. 2000); Richard H. Brown,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naissance Exampl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3, no. 1 (Mar. 1973);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pp. 84—90; T. R. Malthus,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Everyman, 1951, p. 254;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982 [1920], pp. 176—77.

在其他地方，作者提出支撑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至少包括七个大的维度。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79 [1759], pp. 50—54. 当然，很难说社会流动有多少才“够”，多数社会都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见 Bernard Barb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roc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7, p. 336.

社会不流动 (social in-mobility) 是指社会流动渠道的一种特殊安排。在社会不流动的情况下,即使某个个体或群体对增进社会福利有功,他们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也会被剥夺。根据这样的定义,个体或群体的社会不流动就是指在社会流动渠道中针对某个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制度性障碍。社会不流动的存在意味着一定存在享有特权的个体或群体和被歧视的个体或群体。因为只有特权个体或群体才有动机和能力来建立并强化阻止被歧视的个体和群体在地位市场中向上移动(同时保证特权阶级自己及其群体不会下移)的制度安排。

这样界定社会不流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和歧视等同看待。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某种形式的歧视——不管是极端的表现形式(如种族清洗、奴隶制、种族或民族歧视、种姓制等等),还是没那么恶劣的类型(如性别和年龄歧视)——就都会出现社会不流动。由于歧视可以用来削弱甚至剥夺个体或群体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任何可识别群体的社会不流动就都是一种歧视,而任何的歧视也都意味着某个特定群体的社会不流动(所以,这两个术语在本文通用)。

社会流动和社会缺乏流动(或者说社会流动的缺失)(social immobility or lack of social mobility)是指可以观察到的个体或群体在地位市场中的流动性。这样定义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流动或缺乏流动就是个体或群体的禀赋以及努力与社会流动渠道(制度安排)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奴隶制和经济增长

要理解歧视或说社会不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好的出发点也许是托克维尔的不朽著作《论美国的民主》。

奴隶制,作为仅次于种族清洗的一种社会不流动的极端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却是年轻的托克维尔第一次阐明了奴隶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俄亥俄州(成立于1787年)与肯塔基州(成立于1775年)沿俄亥俄河划界而治,左右相望。托克维尔沿河漫步时,不由得为两州之间的差别所震撼。但是,他首先强调:“起伏的大地在俄亥俄河的两岸延伸,供给劳动者无尽的宝藏,河岸上,空气都一样地有益健康,气候都是那么温和宜人……这两个州只有一个差别:肯塔基州容许蓄奴,而俄亥俄州禁止在它的地界里存在奴隶。”所以,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构成了一个“天然的试验”:两个州有许多共同点,而

关于太多真实的或“感觉到的”社会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见 Melvin M. Tumin, Some Unapplaud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bility in a Mass Society, *Social Forces*, vol. 36, no. 1 (Oct. 1957), pp. 35—36。

“社会不流动 (social in-mobility)”是作者新创的一个用法,而用“缺乏社会流动 (social immobility 或者 lack of social mobility)”这一提法来表示能够被观察到的社会流动的缺乏。

通常所说的“歧视”,在社会学里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如信用歧视的用法)。有些矛盾的是,如果按照宽泛的定义,所有的社会都将不得不歧视那些不对社会福利做出建设性贡献的人(如杀人犯、劫匪、流窜的盗贼)。“社会堵塞 (social closure)”是另一个和我们的“社会不流动”有关的宽泛概念。“社会不流动”已被看成是在一个特定社会领域(地位市场)中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堵塞”。有关“社会堵塞”文献的综述,见 Raymond Murphy, *Social Closure: Theories of Monopolization and Exclus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chap. 1。无论是关于歧视还是关于“社会堵塞”的文献都没有讨论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所以,个体或群体缺乏社会流动可能是他们自身缺乏禀赋或缺乏努力的结果,也可能是社会流动渠道中存在的制度障碍所致,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类似的观点,参见 Bernard Barb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rocess* 第14章。

只有一个重大区别，即俄亥俄州禁止蓄奴，肯塔基州则不是。这个“天然的试验”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托克维尔接着写道：“河的左岸（肯塔基州）人烟稀少；偶尔会看到一群奴隶在半荒的田里游荡……社会像是在沉睡，人也懒懒散散……河的右岸（俄亥俄州）则正相反，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宣示着工业的存在；地里长满了庄稼；民居的优雅反映了劳动者的品味和活力……在俄亥俄河的左岸，劳动和奴隶制混为一谈，而在右岸，它则和兴旺、进步连在一起。在这一边，劳动是丢脸的事，而在另一边，劳动是光荣的。在河的左岸，看不到一个白人劳力，因为他们害怕会变得和黑奴一样；所有的活儿都由奴隶来做；而在河的右岸，没有一个人是闲散的，白人都把精力和才智用在各种工作上了。”

总之，到托克维尔游历美国之时，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之间的差别已经非常大了。单单是一个制度安排的差异，就造成了多大的区别！

在托克维尔一百多年之后，刘易斯（虽然没有引用托克维尔）不仅把奴隶制和“垂直流动的缺乏”联系起来，还把奴隶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加以表述。结合刘易斯和托克维尔的论述，可以发现社会不流动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途径是社会不流动削弱对个人的激励：在奴隶制度下，奴隶和奴隶主都没有那么强的工作动机。社会不流动尤其影响对技术和机器的投资：在有充足的奴隶供给的前提下，奴隶主对替代劳动力的技术和机器没有多少投资的动力。所以，在内战前的美国，“只有北方各州拥有船只、制造业、铁路和运河”。

第二，社会不流动导致社会紧张及不稳定。托克维尔洞察到美国南部在废奴问题上面临的深刻困境：“南方人非常清楚，如果奴隶获得解放却永远都不能变成和他们的前主人一样，那么解放奴隶就是危险的。给一个人自由却同时让他处境悲惨并饱受屈辱，无疑就是在培养一个未来的叛乱头子”。这意味着奴隶社会将不得不在控制奴隶上花费更多资源，而能够用于发展经济的投资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社会不流动影响社会合作与协调。由于奴隶们承受着极端的社会不公，他们中存在着（对主人的）强烈不满和仇视。这意味着奴隶社会中存在巨大的社会裂痕，从而势必导致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极端困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自然，社会分裂对经济增长不利，而社会合作与协调在经济体应对外部冲击时又是必不可少的^⑩。

Alex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45 [1835], pp. 362—363.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p. 108.

刘易斯把垂直流动和奴隶制都明确地放在“经济制度”的标题下。显然，刘易斯“垂直流动的缺乏”等于我们对社会不流动的界定。

关于奴隶制对美国南方的经济发展（至少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的观点，参见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pp. 4—6, 191—232.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pp. 108—109.

Alex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p. 364.

Alex de Tocqueville, op. cit., p. 380. 托克维尔在讲完奴隶制之后紧接着就说到美国联邦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也许并非巧合。

这一点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公民价值（civic value）”和“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Alberto Alesina et al.,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8, no. 2, 2003.

^⑩ Dani Rodrik, 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

社会不流动和经济增长

托克维尔和刘易斯关于奴隶制影响经济增长的论述见解深刻。它揭示了作为社会不流动（或说歧视）的一种极端形式，即奴隶制，是怎样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而如果我们把奴隶制看作社会不流动的一种极端形式，就可以把他们二人的观点加以扩展并以此理解所有的社会不流动，并且更加深入地研究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概言之，从根本上说，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歧视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负面作用（即使一些形式的歧视比另外一些在道德上没那么可憎）。这是因为歧视会从三个方面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削弱地位市场中支撑个人努力的激励结构，导致潜在的社会紧张和不稳定，增加合作与协调的成本。

我们很容易直观地理解以上三个方面中的后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两者都会增加促成和支撑经济增长的成本。相比之下，第一个方面则会通过导致其他影响而最终对经济增长造成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负面效应。因此，下面我们集中讨论这个方面。

为此，我们必须先认识到生产（或工作）是经济增长的终极动力，而学习（或者说是知识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事实上，生产和学习从根本上是不可分的，因为生产是一个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生产离开了知识是不可能的，而学习离开了生产也是不可能的。

社会不流动从根本上系统地削弱个人和群体生产与学习的动力，从而削弱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

首先，像托克维尔和刘易斯都意识到的那样，歧视会同时削弱被歧视群体和特权群体工作与学习的动力。一方面，对于被歧视群体来说，歧视意味着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小，因而来自地位市场的激励就要少。另一方面，对于特权群体而言，歧视则意味着他们在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面临的竞争都要少，所以他们也可以学得少一点，干得少一点。

第二，（由社会不流动造成的）缺乏社会流动还意味着被歧视群体的下一代没多少机会出生在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家庭，因而会相对缺乏可投资于学习的资本。而由于社会地位对于个人要不要上大学、走出贫民窟，甚至对教育的成就都有重要影响，所以，歧视还意味着被歧视群体的下一代同样没有多少学习动力。因此，歧视不只影响了一代人，而且还影响下一代在学习上的动力和可投资于学习的资本，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第三，由于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知识或说思想的增长，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终极资源”：庞大的人口不仅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从而能让创新获得更多的回报），而且意味着更多的新思想。而歧视必然导致一个国家对其人才库利用不足。在歧视状态下，国家人才库中的一部分才能，或者没有得到开发或者开发不够，以致不能对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特权人群学习的动力也不足，人才库中的另一部分也因此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歧视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4 (Dec. 1999).

Simon Kuznets, *Toward a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p. 60;

Charles I. Jones, *Ideas and Grow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Working Paper (Sept. 2004);

唐世平：《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George A. Akerlof,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ecisions. *Econometrica*, vol. 65, no. 5 (Sept. 1997).

Charles I. Jones, *Ideas and Growth*; Edmund Phelps, Population Increas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 no. 3 (Aug. 1968).

在本质上就好像“把一国的人口砍掉了一半”，从而可能失去许多潜在的莫扎特和牛顿。这样的情形不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

更糟糕的是，被歧视群体不仅不能对社会福利做出贡献，而且还会成为社会的纯粹负担。正像托克维尔分析奴隶制时所说的：“供养他（即奴隶）的花费是没完没了的……到最后，一个奴隶比一个自由身的仆人花的钱还要多，而他的劳动效率却远不如后者”。因此，被歧视群体不但会成为自己的负担，也会成为特权群体的负担，从而成为整个国家的负担。如此一来，歧视比“把一国的人口砍掉一半”更糟。

最后，也可能是最深刻的影响是，歧视还会造成倾向于复制并强化现存社会秩序的制度和文化的，从而使让人才惨遭浪费的模式不断自我复制。在制度上，特权群体会针对被歧视群体设立向上流动的障碍，因为他们把对其特权的任何侵蚀都视为致命的威胁：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产生的“置换效应（replacement effect）”是特权群体的心头大患。从文化角度来看，“社会规范鼓励人接受他在此生此世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的热望受到严厉压制。这样的价值体系（也许）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固，但不利于经济积累”。

因此，社会不流动或是歧视能从根本上系统地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歧视存在，就必然会产生经济代价。

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四种类型的社会

以上讨论表明，支撑地位市场中激励结构的社会流动渠道，也是经济发展之制度基础的一个关键维度。并且，地位市场和物质市场中的激励结构不同。所以，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个社会必须在两个市场中都为个人提供激励。

由于这两个市场会为个人带来不同的机会，人们将会考虑如何在这二者之间配置自己的才能，而他们的算计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通过扩展“才能配置理论”，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分类来反映激励机制的不同组合会对整个社会，包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深远影响。

第一种组合是指在地位市场和物质市场都不为个人提供激励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权力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176.

Alex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p. 363.

Melvin M. Tumin,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8, no. 4 (Aug. 1953), p. 389; Dennis H. Wrong,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Some Neglected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no. 5 (Dec. 1959), pp. 774, 782.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8831 (Mar. 2002). 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被歧视群体基本学习设施的投资不足，像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城市中心区发生的那样。而对被歧视群体教育投资过少，加上其本身的学习动力下降，将进一步减少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

Jim Granato, Ronald Inglehart, and David Leblang, The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Hypotheses, and Some Empirical Tes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 vol. 40, no. 3 (Aug. 1996), pp. 609—10.

关于才能配置理论，见 William J. Baumol,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Oct. 1990); Kevin M. Murphy,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2 (May 1991). Baumol 曾提出“社会有两类市场，而它们分别为个人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这一观点。

和地位的分配是由出身限定的，并且决定着获取财富和教育的机会”。在这些社会中，官方意识形态不仅支持这种固定的社会地位等级，还鼓励个人“在置身其中的秩序中忠诚地服务上帝”，借以阻止个人对社会流动的追求。在这些社会里，通常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在两个市场都获得地位的提升（这也揭示了历史上不断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多数传统（或说农业）社会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种组合是只在地位市场中提供激励，而不在物质市场中提供激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寻租社会。多数人都会先把才干用于谋求地位市场中的上升，然后再利用获得的社会地位来寻求经济利益。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人的才能对于经济发展毫无益处，甚至会起到破坏作用。严重依赖官僚体制的社会一般都属于这种类型，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前苏联和多数非市场经济国家。

第三种组合是只在物质市场、而不在地位市场提供激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形成一个只有财富而没有权力和地位的阶层。最后，掌握财富的阶层只有两种选择：“发言”或者“退出”。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财富阶层通过暴力手段选择“发言”的例子，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外流现象则至少部分反映了那些拥有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的人，由于不能在地位市场中得到升迁并且也不愿通过暴力来发言，而最终选择了“退出”。

第四种组合是在两个市场中都为个人提供激励的现代工业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和财富的积累是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学习和企业家精神受到很大的鼓励。而且，两个市场中的激励机制互相促进，因此产生了一个没有增长限度的良性循环，社会也就成为“永续发展的社会”，它“无法设立严重的等级、种姓或财产壁垒，因为这将造成无法容忍的社会紧张”：这是因为“尽管人类可以忍受极端的不平等……但必须存在一定的虚幻或者真实的社会流动，而虚幻也必须有一定的真实作为基础才能持续”。

如果假定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一个单向进程，我们还可以勾勒一个关于两个市场的互动及其如何影响人类社会演变的图画。

显然，只有存在不平等，才有可能在两个市场中产生激励机制。如果处于小股群体和部落阶段的多数人类群体果真是平等社会（虽然存在部落首领，从而在地位市场中存在些许不平等或者说一种等级秩序的意味），那么地位不平等的出现很可能早于物质不平等的出现。这样一来，地位市场中激励的存在也就可能早于物质市场中的激励的存在。

Ugo Pagano, Nationalism,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rnest Gellne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7, 2003, pp. 640—41.

David Herlihy, Three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in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 no. 4 (Spring 1973), p. 623.

William J. Baumol,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4—25. 严格地说，这样的人类群落也代表了一种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增长是极其缓慢的，因为其中的激励机制强烈地阻碍积累和创新，见 Gary Miller and Kathleen Cook, Leveling and Leadership: Hierarchy and Social Order, in Karol Soltan, Eric M. Uslaner and Virginia Haufler (eds.),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Melvin M. Tumin,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p. 389; Dennis H. Wrong,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Some Neglected Considerations, pp. 774, 782.

而且，只有在等级社会到来之后，社会流动渠道才有存在的必要。这不仅因为在此之前没有社会分层，而且是因为社会流动的壁垒也只有在等级结构中才会存在。等级社会，根据定义，需要一定程度的服从和人们对自己地位的接受，而只有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才既有动机又有资源来强制实施有关社会流动渠道的规则。

所以，至少在人类社会步出部落阶段之后，地位市场中的激励就一直存在，人们都想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多数人都确实想占据好的位子，这些位子却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多数人的努力在地位市场中都得不到回报。原因是存在阻止个人在地位市场中得到回报的政治壁垒：那些富有且有权力的人，因为他们害怕在政治上被人替代，一般都会将社会制度设计成排斥他人的社会制度。实际上，一些位子越是有权力（或说从它得到的回报越多），占据这种地位的人就越有动力和资源来保护他们的特权地位。

和世袭的权力与地位决定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权力和地位都是暂时的，而且经常是财富决定权力和地位。因此，在现代工业社会，一个人要维持权力和地位就必须不断投入物质与人力资本以积累财富。所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激励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

只是到了现代工业社会，两种市场中的激励机制才得以同时存在。现代工业社会为人们在两种市场中的进步敞开了机遇的大门，使人们在两个市场中的努力可以互相促进，从而促进了社会进步。这样，现代工业社会也使自己变成了“永续发展的社会”，且至今仍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前现代社会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重塑在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中的激励结构。为了（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仅仅在物质市场中提供激励机制或者仅仅在地位市场中提供激励都是不够的，一个社会必须在两个市场上都为个人努力提供激励。换言之，为了实现现代化，一个社会必须从缺乏一种或两种激励机制的社会过渡到在两个市场中都提供激励的社会，让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不仅能得到物质回报，在社会地位上也能得到回报。

社会流动和增长：理论意义

从根本上说，人类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所得，而是还希望得到因社会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满足感（或者说是虚荣心）。因此，要想使人们努力不懈并以此推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社会就必须在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都提供激励。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因为它支持着地位市场中的激励结构），我们也就能对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有更好的理解。

首先，只有认识到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中的一个维度，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为何马尔萨斯盛赞两个市场中激励机制是“惊人地有益”：“如果社会中没人能指望升迁，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获得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壁垒是一种根本性的不公平，并且会最终引发反叛。见 Barrington Moore Jr.,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New York: M. E. Sharpe, 1978.

Melvin M. Tumin,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p. 389; Dennis H. Wrong,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Some Neglected Considerations*, pp. 774, 782.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p. 24—25; Ugo Pagano, *Nationalism,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rnest Gellner*.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p. 50—54, 57.

也没人会担心败落；如果勤奋没有带来好处，而懒散也不会受到惩罚，我们就别想看到那些改善我们自己境况的生机勃勃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现在已成为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同样，只有认识到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中的一个维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歇尔说“产业领袖中工人子弟所占比例最大的地方，进步是最快的”，以及“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高度的垂直流动——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

其次，只有认识到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中的一个维度，我们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大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大众教育可以被看成给予那些出身贫寒的孩子以最初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给他们在社会流动渠道中以最初的推动并使他们能够升迁到更加有利的位置的一个手段。所以，大众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直接传播知识，而且还在于“大众教育是对社会流动的重要保障和承诺”。由于大众教育是对社会流动的重要保证和推力，它强化地位市场中的激励机制，所以能鼓励个人的努力因而推动经济增长。

第三，只有认识到社会流动渠道在支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跨国增长回归分析中，初等教育是预测经济发展如此有力的指标。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为送孩子上学而借贷的困难对穷人的影响更大。而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措施，这种再分配将增大穷孩子的能力和机会，因此，它必定是利于经济增长的。相反，对初等教育的投资不足事实上就是对低收入家庭孩子的一种歧视：那些能够接受初等教育的人有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而那些不能接受初等教育的人则将失去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对初等教育的投资不足一定会削弱经济增长，正如马歇尔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对于国家财富的增长来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那些不幸出身贫寒的天才们始终无法施展才华！”

实际上，马歇尔之所以竭力倡导扩展大众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正是为了推动穷孩子的社会流动：“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没有什么会比改善我们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初中等教育）政策更加有力的了，倘若再能实行广泛的奖学金制度的话。奖学金制度能让劳动人民的聪

T. R. Malthus,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vol. II, p. 254. 最近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工作还表明，如果人们（基于某些现实）认为有向上流动的可能，他们便不会要求太多的于社会无益的再分配，见 R. Bénabou and Efe A. Ok,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the POUM Hypothe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6, no. 2 (May 2001); Roland Bénabou and Jean Tirole,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mimeo (Dec. 2004); Alberto Alesina and Eliana La Ferrara, Preferences of Redistribution in the Land of Equ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no. 5—6 (Jun. 2005)。因此，有利于社会流动的好的制度安排可以促使一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相信自己有机会向上流动，可以使人产生更大的动力，并减少对无益的再分配的需求。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p. 176—177.

Alfred Marshall, op. cit., pp. 179—80.

Richard A. Easterlin,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 1981), p. 14.

Philippe Aghion, Eve Caroli and Cecilia García-Penalosa,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7, no. 4 (Dec. 1999), pp. 1621—24.

Peter H. Lindert, Voice and Growth: Was Churchill Righ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2 (June 2003), p. 325.

Alfred Marshall, op. cit., p. 176.

慧儿孙在学校里逐渐攀升，直到接受那个时代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理论和实践教育为止”。谁知道呢，在那些穷孩子当中，或许就有未来的牛顿或者贝多芬！

第四，一旦我们认识到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中的一个维度，而知识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那么，社会流动渠道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变得更加重要：许多追求知识的人可能对物质所得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在地位市场中的所得（如威望、名声、社会地位，或者青史留名）。马歇尔很久以前就发现：“那些为知识的推进贡献最多的人，很少会在意对财富本身的拥有”。

社会流动和增长：实践意义

认识到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中的“天然试验”，例如，尽管传统中国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是因为其特殊的制度和文化安排的奇特混合，其背后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却是社会不流动。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使一种修改后的儒教成为中华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董仲舒对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修改之一就是逐步淡化了为研究而研究自然的做法（即《大学》里的“博物”），“博物”从那以后逐渐成为“自修课”。因为管理国家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而仅仅需要正直（德）和先贤的智慧，经和史最终成了中国精英们唯一的合法知识来源。随着选拔官吏的国试（后为科举）制度的出现，读经做官也就成为中国读书人（或精英）获得社会向上流动的不二法门。如此一来，研读经书变得非常“有利可图”，而研究科技则“无利可获”。

更糟糕的是，由于对“置换效应”的恐惧，中国的官吏们——他们一般都是因为精通经书才当上官的，没什么科学技术知识——设立了一整套防止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向上流动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追求科技知识的人不仅不会因其聪明才智而得到国家的奖赏，却更有可能因为“耽于奇技淫巧”遭受惩罚。结果只能与“才能配置理论”所预测的一致：中华帝国社会中几乎所有最杰出的人才都最终被吸引到追求那些“无效但是有利可图”的读经习史上面去了，相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177.

Alfred Marshall, op. cit., p. 4.

Justin Yifu Lin,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3, no. 2. (Jan. 1995);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92.

Gungwu Wang, *Loving the Ancient in China*. In Elizabeth McBrady (ed.), *Who Rules the Past?*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1985. 所以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1637 年）的序中满腔愤懑地写道：“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H. M. Wright tra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9; Hsiang-tung Fei, *China's Gen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72—74.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p. 31. 事实上，公元 645 年（贞观十九年）的冬天，当易州司马陈元（通过在屋里烧木炭）发明了温室，从而在中国北方的冬天培育出新鲜蔬菜和水果并把它们敬献给唐太宗（这位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开放的皇帝）时，陈元不仅没有获得嘉奖，而且立即遭到痛斥并被降级，原因是他试图用“奇技淫巧”取悦皇上（《资治通鉴》卷 198）！

比之下，很少有最杰出的人才愿意探求科学和技术知识。因此，自从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开始，中华帝国逐步确立了对追求科技知识的人士的系统性歧视：这种歧视系统而持久，影响也就更为深远，更具灾难性。

和中华帝国对科技人才的系统歧视导致灾难性后果形成鲜明对照的例子是，工业革命前的英国通过鼓励那些对社会福利有积极贡献的商业阶层向上流动，最终促成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繁荣。

在社会流动渠道方面，16世纪以前的英国和别的传统社会并无不同。当时的国家和教会都颁布了法令，不鼓励甚至阻碍并防止社会流动。在当时，下层的人们向上流动的道路只有两条：进入教会事奉，或者在庄园里为领主直接服务。

然而，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候，国家终于开始默许（甚至鼓励）商人先是通过经商再通过购置地产向上流动（这样也就变成了贵族）。在詹姆士一世统治中期，商业已经成为“一个可以通达更有声望的地位的高地”。“对于已经拥有技能、资本或者企业家精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着空前机会的时代”。最终，商业阶层日益增多的向上流动使得他们（尤其是大西洋贸易商人）在英国议院的席位逐渐增加。国会中商人利益代表的增加最终对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制度变革最终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通过允许商人阶层向上流动，英国早在“光荣革命”之前就保持了经济增长。“在工业化的头两个阶段，英国社会分层的显著流动性，由于激发了个人的主动性，无疑对工业的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就不可能有1584—1640年间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在1960年代，许多专家都预言东亚的发展前景将不如资源丰富的拉美。这样一来，东亚和拉美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强烈对比就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构成了一个重大难题。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东亚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物质资本的投入驱动的——几乎是完全错误的。卢卡斯的说法，即东亚奇迹是通过边学边干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给人以启发，但并不是真正的答案。如果东亚可以通过边学边干积累人力资本，为什么在拉美就不能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人力资本的积累只发生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即四小虎），却没有在其他国家，如菲律宾出现？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意识到在这两个地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乃

Justin Yifu Lin,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pp. 284—85.

Richard H. Brown,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naissance Exampl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3, no. 1 (Mar. 1973), p. 60.

Franklin F. Mendels, *Social Mobility and Phases of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7, no. 2 (Autumn 1976), p. 209.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9378 (Dec. 2002);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崛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Franklin F. Mendels, *Social Mobility and Phases of Industrialization*, p. 213.

Richard H. Brown,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naissance Example*, p. 63.

Richard R. Nelson and Howard Pack, *The Asian Miracle and Modern Growth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vol. 109, no. 457 (July 1999); Jesus Felipe and J. S. L. McCombie,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with the Neo-classical Analysis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7, 2003.

Robert E. Lucas Jr.,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etrica*, vol. 61, no. 2 (Mar. 1993).

是它们在社会流动渠道上的差异。

在东亚，特别是那些儒家思想浸淫较深的国家，始终存在一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通过教育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科举制度早就存在。所以，在它们经济腾飞之前，允许和鼓励社会流动的的制度基础早就具备了。

相形之下，在拉美许多国家，权力和特权一直由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精英阶级把持。对这些国家中的精英来说，通过封锁社会流动渠道而尽可能减少政治变化的目标要优先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拉美国家的制度安排更强调阶级、贵族出身和早期进入（earlier entry）。这些制度安排不鼓励社会流动，而且它们存在至今。拉美社会似乎陷入了一个持续的低社会流动、高度不平等、经济低迷甚至崩溃的怪圈。

在大众教育层面上，和东亚国家通常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初级教育不同，拉美一直更偏向高等教育，这反映出其教育政策一直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偏向。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精英主义教育体制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浪费太多人才。

社会流动渠道的差异也能部分解释另一个发生在东亚地区的天然实验——韩国和菲律宾的不同命运。卢卡斯曾经强调过二者的区别，但没有给出真正的解释。1960 年，韩国和菲律宾几乎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而且，菲律宾拥有比韩国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它也没有像韩国那样经历过毁灭性战争。然而，40 年后，两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天壤之别：韩国现在稳居发达国家之列，而菲律宾的经济发展甚至还落后于泰国。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菲律宾落后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其社会缺少流动。韩国鼓励通过个人成就进行社会流动，而菲律宾则像它伊比利亚的殖民母国一样，强调的是阶级、身份和贵族出身。

印度的经济落后同样也可以用相似的逻辑来部分地解释。在印度，基于种姓制度、部族、阶级和种族的歧视仍旧相当强大，这些歧视都严重阻碍社会流动。而印度的教育政策中也同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偏向。

这些国家有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日本、朝鲜、新加坡、韩国和越南。泰国也有点沾边。但菲律宾显然不是这个圈子里的。必须指出一点：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儒家只强调从古代经书中学习。

Kenneth L. Sokoloff and Stanley L. Engerman, History Lessons: Institutions, Factor Endowment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3 (Summer 2000), pp. 223—228.

Peggy A. Lovell and Charles H. Wood, Skin Color, Racial Identities, and Life Chances in Brazil.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5, no. 3 (May 1998).

Lykke E. Anderson, Social Mobility in Latin America; Juan Luis Londono and Miguel Szekely, Persistent Poverty and Excess Inequality: Latin America, 1970—1995,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 3, no. 1 (May 2000); Dani Rodrik, 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

See Peter H. Lindert, Voice and Growth: Was Churchill Right? 例如，1985 年，委内瑞拉把 43 % 的教育预算都花在了高度教育上，而在韩国，这个数字仅占 10 %，见世界银行（1993），pp. 197—203。

Robert E. Lucas Jr.,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Peter H. Lindert, Voice and Growth: Was Churchill Right, p. 338.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教育制度都是一个面向平民大众的制度，这也正是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人文发展指数要比印度好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国在 1990 年代后的教育“产业化”改革使本来精英主义色彩较淡的中国教育体系也变得相当精英主义了（比如，如果作者出生在 15 年前的话，恐怕是上不了大学的）。可以预计，这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在未来显现出来（可以说，中国在 1990 年代后的教育产业化使得许多出身贫寒的孩子无法受到更多和更好的教育，等于浪费了许多出身贫寒的天才）。所幸的是，中国政

认识到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近年来的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国家废除了私有企业，商人地位不高。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渠道开始向商业精英们开放。在文化层面上，致富也不再可鄙，反成为一种“光荣”。同时在制度上，中国共产党最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鼓励新富阶层入党，从而使他们能够成为地位市场中权力精英的一部分。

结 语

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太过关注物质市场，而忽视了亚当·斯密的一个根本性洞察，即社会地位（或说虚荣心）同样是驱动个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同时，社会学更关心的又是如何解释社会流动。结果，对“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增长之制度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可能性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

将关于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之影响的许多零散观点整合到一个更加有机的框架内，同时把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更加经济学的术语表达出来，再加上把社会不流动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种族清洗和其他温和一点的社会歧视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歧视，我们的讨论表明，社会流动渠道，或者说调节地位市场中激励结构的制度体系，是经济增长之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而且，在认识到和产权调节物质市场中的激励结构相类似，社会流动渠道也调节地位市场中的激励结构之后，我们还考察了两个市场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的互动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

显然，我们的讨论对未来的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应该更多关注调节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基础（比如阻碍社会流动的壁垒），而不是社会流动率本身。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度量有关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的质量，有了这样一个度量以后，就可以用跨国增长回归分析来进一步研究社会流动渠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我们的讨论也有重要的政策意涵，而且这一政策意涵是直截了当的，即任何对合法的社会流动的阻碍（或者说歧视）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为它等于将一个国家的人口减半甚至更糟。所以，每个国家都应该消除歧视，这符合它自身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利益和道德是一致的”。

〔本文责任编辑：李存娜〕

府较快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从 2003 年起开始着手纠正这一严重失误。

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正在做的和英国在 17、18 世纪所做的是同一件事：允许新兴商业精英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

Alex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p. 365.

real estate equilibrium price and the fluctuation in real estate prices with the co-integration theory and H-P filter, and concludes that real estate price deviation exists in some regions of China. In other words, the bubble is regional. Furthe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the economy with a time-varying model and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and finds a structural break betwee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the economy as a whole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est rate lacks elasticity, pointing t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efforts to adjust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rough interest rates. But changes in credit scale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The result of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shows tha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has a long-term influence over economic growth and related industries.

(7) Social Mobility, Positional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stitutional Reinterpretation

Tang Shiping · 85 ·

The channels of social mobility, or in other word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underpinning social mobility, are a critical dimension of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the channels of social mobility are what underpins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in the positional marke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extends the concept of “social immobility” to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from ethnic cleansing to gender and age discrimination, and explains how social immobility hinders economic growth. The article also indicate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centive structures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positional market, as well as their impact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ay facili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8) Ris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Zhao Litao · 98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using data from one of the surveys most widely employed by foreign-based sociologists. Compared with earlier studies that show rather low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throughout the 1980s, this study finds a remarkable change in the 1990s—the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was considerably higher in 1996. A chief contributor is rapid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hich creates enormous upward mobility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for the more educated. Due to uneven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ationwide, returns to education vary widely across localities. In villages where the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has yet to take off, returns to education remain low. In contrast, in villages where off-farm employment is widespread, returns to education are much higher. This study further finds that the labor market is functioning to allocate the more educated to better paid jobs, but has yet to produce higher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the non-agricultural than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However, changes may be occurring in coastal areas.

(9) Associ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Organic Solidarity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Gao Bingzhong · 110 ·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realize individual or common goals through cooperation among themselves and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paper uses Durkheim's “organic solidarity” to identify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urrent China by viewing associational co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s self-determined goals, independence, freewill cooperation and even